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中战略对话：要补益，别放弃

G20 峰会——中国将取得哪些成就

经济溢出与政策应对

人民币国际化的经验教训

英国脱欧的金融业后果

英国脱欧：滑入第 50 款深渊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黄杨荔

李笑然

刘天培

谢晨月

伊林甸甸

张舜栋

张亦培

朱子阳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侯书漪	科研助理
	安婧宜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侯书漪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为什么全球化是有代价的 3

导读：本文提出，尽管政治上不利因素存在，世界领导人应该敦促更多政策自由化并投入未来全球化的怀抱，而不是退回到分离的国家市场。全球化给整体经济带来的收益以至少十比一的比例碾压给工人带去的损失，因此那些表示应该摒弃全球化或全球化令每个人更加贫穷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

美中战略对话：要补益，别放弃 5

导读：本文认为美中战略对话搁置了很多问题，是不完美的。但美中不应该放弃战略对话，中美需要这样的机制来加强交流。美中应该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提高美中战略对话的有效性。

全球治理

G20 峰会——中国将取得哪些成就？ 7

导读：今年9月，中国将首次作为主办国举行G20峰会。那么，中国将利用这次机会在哪些领域推动自己的主张？又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怎样的成就？本文分别给出了分析和预测。

经济政策

经济溢出与政策应对 10

导读：本文是IMF现任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挪威银行成立200周年庆典上的演讲稿。演讲指出，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不应仅着眼于本国经济目标，还应考虑对全球各国的溢出效应。

聚焦中国

人民币国际化的经验教训 13

导读：中国当局一直在力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活动中的使用。本文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美元，日元和德国马克的经历。只要中国周边经济体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还在使用美元，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并不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迅速上升。

脱欧专题

关于民意、脱欧公投及欧盟的六个教训 15

导读：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被视为民众的胜利。然而，这将引发何种后果？

英国与欧盟又将怎样应对？

英国脱欧进展有多快：一些技术性探讨 18

导读：在欧盟，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规定了由脱欧成员国政府告知欧洲理事会，从而启动脱欧程序。并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双方就脱欧事宜达成一致。因此英国政府告知欧洲理事会的时间决定了英国脱欧进展的速度。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辞职演讲中表示将由新任首相决定启动时间，而欧盟机构和其他成员国对此只能持观望态度。

英国脱欧的金融业后果 20

导读：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此举给英国和欧盟带来了新的机会和风险。二者都可能受益，但更可能的结果是金融规则的质量下降，效率的下降，更多的贸易保护和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英国脱欧：滑入第 50 款深渊 24

导读：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但脱欧涉及复杂的欧洲法律程序，其中之一就是第 50 号条款，作者围绕这一条款，展开了细节分析。

使欧盟更坚韧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26

导读：英国退出了欧盟，这对双方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它可能为后续的负面冲击和政治影响做出了铺垫。VOX 欧盟评论专家团在本文中提出了提高欧盟坚韧度的一些意见。

本期智库介绍 29

为什么全球化是有代价的

Gary Clyde Hufbauer /文 伊林甸甸/编译

导读：本文提出，尽管政治上不利因素存在，世界领导人应该敦促更多政策自由化并投入未来全球化的怀抱，而不是退回到分离的国家市场。全球化给整体经济带来的收益以至少十比一的比例碾压给工人带去的损失，因此那些表示应该摒弃全球化或全球化令每个人更加贫穷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编译如下：

伴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Trump）竞选浪潮，有评论家预言全球化将面临终结。从政治层面上看，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即使在英国脱欧前夕，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已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面临政治障碍，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像雨后春笋频频涌现。自2010年起反全球化政策对世界贸易和投资反常的温和增长作出了贡献。

但在“终结”全球化政策前，我们还是有必要谈一谈美国参与世界经济的好处。在周日专栏中，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援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称，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更深入地参与世界经济，使家庭实际收入每年增加一万美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也从二战后的全球化中获益，无论是贸易协定、交通还是通讯技术方面，目前美国GDP年增长超过一万亿美元。

这些收益的作用渠道是多样的，其中有一些显而易见，而有些则不然。这些渠道都和相对GDP进出口、对内或对外直接投资相关联，这种现象描绘了美国经济从二战以后到2010年的发展和停滞。

也许最明显的是出现于沃尔玛、塔吉特、亚马逊和其他成千上万零售商的廉价进口商品。这其中许多商品在美国已经不再生产了，如果美国生产这类商品，那么它们的零售价格将会远远高于目前价格——想想看跑鞋、T恤和电视机的例子你就会明白。同样地，美国公司通过出口目标过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如波音飞机、电影大片）或当地高生产成本的商品（如鸡肉、玉米、CAT扫描、涡轮机）来提高国外生活水平。这些都是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的日常案例，几乎每个大学生都学过这个概念。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更多种类的流通渠道不仅受家庭消费者享有同时也受商业公司享有。进口使他们能够购其所需，无论是设计汽车引擎或测试药品所需的应用软件，还是柚木或红木制作的餐厅饭桌。

容易被忽略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全球化竞争增加了每个工人的生产力。经过“筛选和排序”的过程，竞争迫使生产力较低的企业萎缩而使更高效的企业扩

张。因此，高生产率的企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提高了每个工人的平均生产力。进口和出口都带动了这一筛选和排序的过程。

一个类似但不同的现象是，这种竞争给管理者带来了捍卫他们国内和国际上市场份额以增强竞争优势的压力。这适用于拥有更强大竞争对手的任何公司。提高一个企业的竞争力需要新产品和新工艺，即需要在厂房、设备和研发方面更多投资。这也要求企业在可变成本上调整加价利润。这是获取全球化竞争优势另一个隐蔽但重要的方式，即使对美国这一巨大经济体来说也是如此。

连接大量流通渠道是全球化通过改造每个国家市场发展方式而促进所有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现代化生产背后的研发和专业知识是极其昂贵的，然而一旦新技术得以开发，便能以原来成本的一小部分为代价运用到世界各地。

以相对 GDP 进口、出口和直接投资来衡量的全球化进程—自 2010 年起一直运行不畅，世界经济复苏在过去六年中一直低迷，所有形式的投资已经滞后，自 2010 年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均生产力增长已经不大于过去六十年的一半水平（如今略高于 1% 和历史上的 2%）。而这一切并非巧合。

尽管政治上不利因素存在，世界领导人应该敦促更多自由化政策并投入未来全球化的怀抱，而不是退回到分离的国家市场。可以肯定的是，领导者们还应该立即为那些迷失于全球化的国家调整方案。但是，全球化给整体经济带来的收益以至少十比一的比例大于给工人带去的损失，那些表示应该摒弃全球化或全球化令每个人更加贫穷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

本文原题为“Why Globalization Pays”。本文作者 Gary Clyde Hufbauer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6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中战略对话：要补益，别放弃

Claire Reade /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美中战略对话搁置了很多问题，是不完美的。但美中不应该放弃战略对话，中美需要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加强交流。美中应该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提高美中战略对话的有效性。编译如下：

上次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离我们越来越远，但留下了一系列问题：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于中美关系发挥什么作用？是否应该继续，放弃还是修正以提高有效性？我的底线是：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不完美的，但是解决方案涉及到目标调整，不应该放弃符合美国利益的程序。

美中战略对话开始于 2009 年，议题覆盖一系列全球，区域和双边政治和安全问题。战略对话的初始理念并不追求“立刻的解决方案”，而是“讨论长期面临的战略挑战”。但是，国会两党抱怨中国在贸易和汇率问题上一直不采取措施，促使战略对话追求立刻的进步以及更广泛的讨论两国经济长期的战略方向。这种双重焦点在奥巴马时代一直保持着。

美中战略对话具备如下几个有益的特点：首先，它由两国总统直接参与和监督。这可以确保总统了解所有的相关问题，在做决策时可以考虑各国的利益，而不是只关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部门。事实上，在习近平时代，总统之间的联系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固相当重要。第二，总统特别指定对话的方向，一个是战略对话，一个是经济对话。这有助于提升中国各个部委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事实上，中国的各个部委之间很难进行协调。给予参会的部委领导指定议题，有助于解决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创新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的待遇,产能过剩，扩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技术协议,和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议。第三，两个国家承诺每年举行一次战略对话。这有助于两个国家共同面对双边经济问题，建立稳定的关系。

但是，举行战略经济对话也是有成本的。在会议召开之前，需要和各个专家以及高级官员进行充分的沟通，确保每一个人负责的议题都能够达成一致，才能取得重大进步。每一次会议持续两天，加上路上旅程时间，在两个国家领导人之间找到一致的时间非常困难。而且，中国非常重视仪式，每次参会都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由总统赞助的高水平的对话值得很多高级官员出席，尤其是当对话的议题比较有意义时。在过去，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确实取得了一些

成绩，但也会搁置很多议题，比如监管透明性，竞争法以及国家安全原则。没有取得一致的结果，也不意味着对话的失败。比如，气候问题一直是两国关注的问题，但并没有达成一致。通过战略对话，有助于两个国家互相了解双方对于此问题的看法和担忧，便于在巴黎气候国际大会采取措施。

一些外部的观察人士质疑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范围。就经济问题而言，外界人士认为涉及的问题过多，对话应该局限于几个关键的具体的问题。但有人认为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涉及的问题较多，仅仅关注几个问题难免会伤害到其它方的利益。而且，在会议之前，很难确定对话的哪几个方面会取得成功。如果将对话讨论的范围限制过窄，很容易使战略对话陷入僵局。因此，多涉及一些问题是有益的。其实，美中战略对话的范围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和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相比，商贸联合委员会讨论的话题范围更加宽泛，而且，有些话题并不值得那么高度重视。

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视美中战略对话。该对话为中国解决传统官僚保护机制提供一个新颖有效的解决途径。有助于最高领导层充分了解当前面对的问题。但是美国的领导人批判性的看待美中战略对话，并思考如何提高其有效性。考虑到习近平主席对党政领导集团的依赖，美中战略对话原本是“政府对政府”的对话，现为“政府对党”的对话，有助于美国高级官员与中国的党政领导集团进行会谈。另外，中国一直指定部委部长接待美国内阁成员，但是美国内阁成员的权利与中国副总理的权利相当，都是直接向主席汇报工作，为了提高问题交流的效率，中国需要做出改变。

本文原题为“The U.S.-China S&ED: Time to Tinker, Not to Toss”。本文作者 Claire Reade 为 CSIS 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6 月刊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G20 峰会——中国将取得哪些成就？

Sean Miner /文 张舜栋/编译

导读：今年 9 月，中国将首次作为主办国举行 G20 峰会。那么，中国将利用这次机会在哪些领域推动自己的主张？又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怎样的成就？本文分别给出了分析和预测。编译如下：

今年九月，中国将首次作为主办国举行 G20 峰会，全国上下都在为这一盛事而努力筹备中。而在会议的诸多议题中，中国尤为关心的是加快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近年来这一领域的诸多努力都面临停滞不前的窘境。2016 年 7 月 9 日，中国将在上海举办 G20 国家商务部长峰会，讨论如何通过 G20 论坛的框架促进全球贸易与投资合作。

作为峰会主办国，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来带领世界经济和贸易走出增速疲软的困境。在本届峰会中，中国有四大目标，可以概括为四个“1”：

1. 创新（Innovative）：创造新的增长领域（如新的数字化时代）；
2. 变革（Invigorated）：引领全球金融体系改革；
3. 联系（Interconnected）：加强国际贸易与投资；
4. 包容（Inclusive）：依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减轻贫困及不平等；

中国向来宣称它支持多边贸易体系，但随着 WTO 的影响力日益下降，中国正寻求通过 G20 平台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不幸的是，G20 在这一领域的历史表现并不算好。国际商会（ICC）对 G20 在贸易领域的评价是“差”，这一评价也列居各政策领域评分的末尾。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对于中国的增长而言至关重要，那么，中国想通过 G20 达成哪些具体的目标呢？

由 WTO 三年前组织开展的贸易促进条约（TFA）谈判迄今为止还需要参与谈判国家当中的三分之二（108 个国家当中的 82 个）批准才能够通过。TFA 协议一旦成功，将有望使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下降 17%，而低收入国家也有望获得更多实际利益。中国应利用自己的 G20 主办国地位，推动 G20 国家当中尚未批准这一条约的五个国家通过该条约。如此一来，更为团结的 G20 国家就有望为其他尚未批准的国家做出表率，并在 2016 年底到来之前，将 TFA 的谈判进程向前推进一大步。

G20 也需要重申其反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宗旨，并淘汰存在于各国中与 2008 年华盛顿峰会精神相违背的行为。据一份近期出台的报告显示，自 2015 年 10 月以来，G20 国家共通过了 145 条新的贸易限制性政策，自 2009 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还从来没有如此甚嚣尘上过。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自然应该做出表率，逆转这一趋势。

另外，中国也可以为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做更多基础性工作。作为全球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目标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对于更为合理的投资规则有强烈的需求。不同于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相应的国际组织加以协调。中国可以利用 G20 峰会的契机，开拓性地为全球投资治理体系做出贡献，这一体系即可以参考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的章程，也可以参考美国、中国、欧盟等国进行的双边、多边谈判协定。

中国可以利用 G20 平台推动《环保产品协定》（EGA）在 WTO 中得以通过。这一协定力求使针对有关环境保护的产品的关税降到最低。目前这些产品大约有 150 种，而有报告指出一些国家希望将产品名单扩大到 200 种以上。

但不幸的是，中国并不属于这些国家的行列，而且中国据称对这一协定的谈判施加了“关键性的阻碍作用”。如果中国真心希望主导多边贸易体系，它就应当克服其国内的既得利益，并且支持这一协定的谈判。另外，中国有着利用国际协定倒逼国内改革的历史，这一习惯也应该得到改正。

同时，最近商界也有不少关于电子商务的呼声。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马云最近宣称，希望 G20 能过建立一套全球的数字自贸区，从而使得中小企业得以通过互联网扩大其业务范围。这是一项宏大的议题，中国可以从这个九月开始着手这一事业的推进。

G20 有望为今年的 TFA 谈判施加有力影响，但通过反击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性措施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如果想要复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反对贸易保护就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投资，目前来看还少有政治上的意愿推进相关协定的通过，但通过一些不痛不痒的非限制性条约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通过实质性协定困难重重，但中国必须在这一领域做好表率，为下一届 G20 峰会召开时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积蓄力量。

进一步地，如果能够借此机会结束 EGA 的谈判，G20 无疑将进一步加强 WTO 的团结与影响力。毕竟，这是 WTO 九年来唯一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谈判。

中国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推动，将使得 G20 有望成为产生新的培育贸易自由化思想的论坛。现实地讲，G20 要想通过实质性的贸易与投资协定尚需时日，但中国将把这一接力棒传递给下一届峰会主办国德国，并使其有更多机会，将中国提出的诸多议题向前继续推进。

本文原题为“[What Can China Accomplish with its G-20 Presidency?](#)”。本文作者 Sean Miner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中国项目研究主管、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6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经济溢出与政策应对

Christine Lagarde/文 张亦培/编译

导读：本文是 IMF 现任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挪威银行成立 200 周年庆典上的演讲稿。演讲指出，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不应仅着眼于本国经济目标，还应考虑对全球各国的溢出效应。编译如下：

纵观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和金融震荡的产生与传导，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各国正前所未有地以更多样、更复杂的方式相联系。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有必要更好地理解一国的发展如何在经济、金融甚至政治等各个维度溢出到千里以外的其他国家。

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都是经济溢出的源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货币政策一直以来都影响着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而现在，无论在区域还是全球尺度，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成为经济溢出的产生者：想想中国，俄罗斯和巴西。

1. 当前两大溢出源头

首先，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增速放缓，而增长模式更可持续。这是全球经济增长，尤其是国际贸易增长降温的原因之一。我们估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1 个百分点，将导致全球 GDP 增长下降 0.2 个百分点。中国的溢出效应绝非无足轻重。正如 IMF 首席经济学家 Maurice Obstfeld 最近所言：“全球稳步、同步发展这一神圣的目标始终难以实现。”

第二大溢出来自石油市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中国需求预期下降，原油供应量大，这几大因素共同导致原油价格一路下跌 70 多个百分点。尽管原油价格在 2015 年小有回弹，市场预期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油价仍将保持低位。

从全球尺度看，油价下跌使得收入在不同国家间重新分配——从主要的原油出口国如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挪威，到主要的原油进口国如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

面临剧烈下挫的油价和陡增的财政压力，许多商品出口国亟待调整。大部分国家不得不大量削减财政开支，减少在能源和其他部门的投资，允许汇率贬值：巴西的实际有效汇率贬值 25%，俄罗斯则贬值 15%。还有一些国家不得不更进一步放弃固定汇率制，如哈萨克斯坦。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国家在财政和政策上仍有较大的缓冲空间。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和政府养老基金有效缓解了油价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然而，即使是缓

冲余地充裕的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也需要慎重考虑对其财政和增长方案进行重大调整。

显然，油价下跌严重影响了石油出口国。但毕竟这些国家只贡献了全球 GDP 总额的 15%，而剩下的石油进口国都享用了一笔“天降之财”。也许这些增加的消费将抵消出口国的损失，全球经济增长反而会因油价下跌而反弹？事实上，这笔“天降之财”也只在美国和欧洲有些风声，而日本的私人消费基本没有回暖。

因此，与历史周期相比，低油价并没有帮助减轻其他因素对石油进口国的拖累，也没有消除其不平衡的复苏模式，如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债务积压，信贷增长缓慢，就业和工资水平低迷，贫富差距扩大等等。

不仅如此，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显著缩小的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也略有回升。中国经济转型本来是不平衡缩小的重要动力，而其他国家在近年来却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了。2015 年，美国的外债上升，与此同时，欧盟和日本的盈余也在扩大。按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很可能导致全球性危机。

2. 政策应对——平衡本国和外部经济考量

在许多情况下，本国和外部经济目标并行不悖。例如，在德国进行财政和结构性改革不仅提振私人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还可帮助缩小其经常账户盈余。

当两者冲突时，政策制定者自然会将本国经济增长看作第一要务。然而，与此同时，各国也应当考虑经济政策对别国的溢出效应。

以美联储为例，在其考虑是否加息时，加息对新兴经济体的溢出效应，以及反过来这些溢出对美国的影响，都需要再三忖度。这体现了理解各国间在实体和金融方面的联系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宏观审慎政策在减轻金融溢出导致的波动方面的重要性。

重点是，应当在本国目标居首的同时限制负面的溢出效应，采用平衡二者的混合政策，避免以邻为壑效应(Beggar-thy-neighbor Effect)。

3. 再接再厉，增强抗逆力——以挪威为范例

挪威是一个拥有较大出口部门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的波动和外部经济环境对本国影响深远。挪威中央银行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并非易事。挪威政府养老基金等财政政策工具在缓冲价格波动，缓解经济下行冲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全球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挪威银行未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中期来看，全球经济将保持低迷，价格和利率很可能仍将在低位徘徊。对挪威而言，这意味着全球对其传统出口部门的需求减弱，养老基金增速放缓，向非石油出口国的转型更为困难，而家庭债务问题将持续威胁挪威的金融稳定。

我毫不怀疑挪威已经做好准备迎接这些挑战，也始终认为挪威在倡导和平和自由贸易等方面是全球的领先者。在此，我感谢挪威银行和所有挪威公民的支持。

本文原题名为“Managing Spillovers—Striking the Right Balance of Domestic Objectives and External Stability”。本文作者 Christine Lagarde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任总裁，此前曾任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内阁农业部及贸易部部长与弗朗索瓦·菲永内阁经济、工业与就业部长。本文为拉加德为挪威银行 200 周年庆典撰写的演讲稿。[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人民币国际化的经验教训

Hiro Ito 和 Masahiro Kawai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中国当局一直在力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活动中的使用。本文研究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美元，日元和德国马克的经历。只要中国周边经济体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还在使用美元，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并不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迅速上升。编译如下：

最近几年，中国当局一直在力推人民币国际化。考虑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SDR，是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重要一步。但人民币最终会成为什么货币？也许会像美元一样成为全球货币，也许会像欧元一样成为区域性货币，或许像日元一样既不能成为区域货币也不能成为全球货币。

尽管我们不能预测人民币的未来，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很多研究人员都在研究一国货币在成为国际货币之前在贸易定价中的使用。贸易定价是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一步。本文实证分析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美元，日元和德国马克在贸易定价中的使用。

货币贸易定价的典型事实

数据分析可知，日元在贸易定价中的比例与对日元的出口比例明显不相符，日元作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在贸易定价中使用的比例很小。美元则恰恰相反，与美国的贸易中基本都是使用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德国马克则处于二者之间，德国马克主要在与周边经济体进行贸易往来时作为定价货币，显然德国马克是个区域性货币。欧元则处于美元和德国马克之间，欧元作为定价货币的比例充分反映了与欧盟的贸易份额。

美元成为主要定价货币的原因如下：第一，美国一直就是世界上比较大的贸易经济体；第二，美国具有一定广度，深度和较好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第三，美元区经济的范围较广，有助于采用美元计价。

德国马克主要是由于德国周边的经济体发展程度相似，人均收入较高，而且德国的经济环境比较稳定，所以周边国家的企业都倾向与选择德国马克作为贸易定价货币。而日本周边的经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而且都是美元经济，这些国家的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一般采用美元定价。

回归分析

文章实证分析了第三方经济体使用美元，日元，德国马克，英镑和瑞士法郎作为贸易定价货币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首先，贸易定价货币的份额与该货币国家贸易出口份额正相关，但美元除外。也就是说，美元的使用并不是由于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第二，本国的金融市场越发达，越不倾向于使用第三方货币作为贸易定价货币。第三，大宗商品贸易比例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使用美元作为贸易定价货币。金融不稳定的经济体倾向于使用德国马克作为贸易定价货币，并把德国马克作为货币锚。

另外，我们发现，不同货币区域的货币权重和贸易份额会影响主要货币作为贸易定价货币的份额。例如，美元经济体的国家更倾向于使用美元作为贸易定价货币。而且，一个国家与美元经济体的贸易联系越紧密，越倾向于使用美元作为定价货币。这也可以解释在欧盟成立之前为什么德国马克是主要的区域货币。而日本周边的经济体都是美元经济体，所以较少使用日元作为贸易定价货币。

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

自 2009 年人民币开始国际化以来，人民币越来越多的被作为结算货币。但这远远赶不上中国在世界贸易的份额。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并且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这有助于人民币作为贸易定价货币。但是，考虑到中国金融当局在 2015 年和 2016 年早期对中国大规模资本外流采取的金融市场干预，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去监管和开放是否会顺利推进？更重要的是，和日本一样，中国周边的经济体都是美元经济体，只要周边经济体继续使用美元从事贸易和金融活动，人民币国际化就会面临挑战。

本文原题为“Trade invoicing in major currencies in the 1970s-1990s: Lessons for renminbi internationalisation”。本文作者 Hiro Ito 为波特兰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Masahiro Kawai 为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的教授。本文于 2016 年 6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关于民意、脱欧公投及欧盟的六个教训

Guntram B. Wolff/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被视为民众的胜利。然而，这将引发何种后果？英国与欧盟又将怎样应对？编译如下：

“…这将是一场真实民众的胜利，普通民众的胜利，正派民众的胜利”。这是英国独立党领袖 Nigel Farage 在6月24日庆祝“独立日”时的讲话。他还说道，“我们反对跨国公司，我们反对大型商业银行，我们对抗大政治，反对谎言、腐败和欺骗。而今天，我认为诚实、正派和对国家的信仰将胜出……”，“我相信这场胜利将打倒这个失败的项目，引导我们成为欧洲的主权国家”。这些话将传遍整个英国、欧盟和世界各地。接下来几个月，他们需要展开实质性的辩论。以下，我从六方面进行反思。

1、“真实民众”

当75%的年轻选民投出留欧票，格拉斯哥等贫困城市也投出留欧票以保证其作为欧盟公民的权利，“真实的、普通的、正派的民众的胜利”意味着什么？“真实的”和“不真实的”民众是语言上的区分，应该振臂高呼。

胜利公布后的24小时内，社交媒体充满了对生活在英国的那些具有外国背景的正派、真实的人们的仇外攻击。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有毒的、离间民众的竞选。

2、宪法与政治危机

公投给英国留下了政治和宪法危机。显然，脱欧派并不相信他们能赢。苏格兰首席大臣已经宣布，苏格兰可以发起第二次公投以决定是否留在欧盟，而工党领导人们已经下台了一半。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接受触发第五十条款退出谈判的责任（并且很可能不会触发）。

在此情况下，来自欧盟六个创始成员国外交部长及欧洲议会的压力可能不太有益。英国已经从法律上正式启动了官方程序，欧盟应对此尊重。英国的政治和宪法危机只能通过这一途径解决，拖延对所有欧盟国家和社会而言都是昂贵的。

3、不平等

我们应仔细考虑：这一投票结果是否是对“跨国公司和商业银行”的对抗，以及其与欧盟的关系。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远高于欧洲大部分大陆国家。尽管欧盟的福利开支巨大，正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指

出，欧盟在全球人口占比 5.7%，在全球 GDP 占比 22%，在全球福利开支占比 50%。

我们也必须承认，欧盟改善了工人的权利。工党领袖杰瑞米·柯柏恩警告，若英国脱欧，“工人权利的篝火”或在英国燃起。我们必须认识到，许多受益于欧盟基金的英国地区也强烈支持脱欧。但是，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中产阶级压力增加，南欧劳动参与率下降、青年失业率高企都是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

我认为，欧盟提供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答案不够好。真实情况是相比其他地区比如美国，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模式产生的不平等更少。这对欧洲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成功，但人们了解甚少。

Bruegel 和各国政府都需在这个问题上深入研究，以便认真解决。这需要更多的逆周期宏观政策，以及致力于提高社会流动的社会政策，并且要求我们支持适当的企业税、遗产税。然而，这些问题是否是英国的主要问题，答案并不明确。

4、协商

欧盟与英国的谈判如何触发第五十条款？如果触发，将在何时？我们已经可以预见两种不同方法。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愿意给予时间以适应英国的一些可能要求，尤其是国内经济利益的表达，她还强调了关注欧盟 27 国的需要。相反，法国对英国的态度似乎更加强硬，并且将焦点放在欧元区上。

我认为，我们的方法应该基于我们的原则：如果英国希望与欧洲大陆维持贸易，就必须尊重法律。比如，如果英国不尊重上述工人权利指令，就应对英国实施贸易惩罚，以避免在欧洲大陆的倾销等。坚持单一市场的所有成就将是问题的关键。

谈判的核心主要集中于金融服务领域。英国专员乔纳森·希尔的辞职即反映出英国在金融事务方面影响力的萎缩。脱欧后有多少金融服务将从伦敦撤离，是一个重要但悬而未决的问题。欧盟的预算维度可能不那么重要，不过别忘了，财政预算用于帮助那些经济表现较差的区域。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农民的支持，但只有在各国都接受相同的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单一的农产品市场才可能达成。

5、欧盟需要改革吗？

答案是肯定的。脱欧危机爆发前，Bruegel 的许多学者一直在呼吁、建议改革。如今，改革的需要只增不减。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每一个人之间都存在关联，一个国家无法通过孤立的方法来实现改革、改善“真实”民众的生活。

成功的改革必须由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共同行动才能实现，没有比具体行动更好的方式来巩固各国间的友谊和信任。当然，我们需要一个愿景，但也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在短期建立信任。

我们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改革？在此，我强调三方面：

- 欧元区及各国政府尤其重视需求管理和相对价格调整方面的政策；
- 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一旦英国脱欧，欧盟的非欧元区国家在欧盟 GDP 占比仅为 15%，欧洲货币联盟的深化将不可避免影响这些国家。移民与国防政策更偏中性，但也饱受争议；
- 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模式。欧盟在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模式方面是一个领导者，也在许多方面有所成就。如何塑造未来的增长模式以利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代际分离的增长模式。

6、经济方面的紧急行动

首先，决策者必须保证金融稳定。这主要是央行的任务，但政治家应提供更多支持，尤其是对欧央行采取任何必要行动以稳定经济的支持。

其次，宏观政策需有所反应。各国股市已遭到严重影响，并且脱欧可能为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带来重重压力。在通胀水平接近零、货币政策逼近零下界的局面下，财政政策与结构性政策能否发力至关重要，我们显然承受不起新一轮衰退。

更大的困难在于英国经济的宏观稳定。货币政策的施展空间高度受限，而财政叠加经常账户双赤字又是另一个约束。当然，英镑贬值有助于刺激英国经济，但脱欧冲击对英国声誉的“余震”可能会削弱英国未来几年的竞争力，对资本外流、投资下滑情况进行仔细考察将非常重要。

本文原题为“Six lessons about ‘real’ people, Brexit, and the EU”。本文作者为 GUNTRAM B. WOLFF，Bruegel 研究所所长。本文于 2016 年 6 月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脱欧进展有多快：一些技术性探讨

Nicolas Véron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在欧盟，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规定了由脱欧成员国政府告知欧洲理事会，从而启动脱欧程序。并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双方就脱欧事宜达成一致。因此英国政府告知欧洲理事会的时间决定了英国脱欧进展的速度。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辞职演讲中表示将由新任首相决定启动时间，而欧盟机构和其他成员国对此只能持观望态度。编译如下：

欧盟一直处于扩张模式，直到英国在 2016 年 6 月 23 日采取了反击。英国脱欧公投成为欧盟扩张进程出现逆转的史无前例的标志性事件。

过去，曾经存在过一个国家在法律上不属于欧盟，但政治上属于欧盟的情况。这在 20 世纪初是常见的做法，当时预期一些前东欧国家将于 2004 年正式加入欧盟，为了邀请这些国家参与欧盟委员会的投票，欧盟采取了上述办法。然而这次情况有所不同，英国在法律上是属于欧盟的，但在政治上却坚定地站在欧盟之外。从现在开始，欧盟将例行公事地进行大量政府间对话，当然不包括英国，即使英国的会员身份仍保留。

与此同时，英国的两个组成部分：北爱尔兰和苏格兰，正寻求政治上留在欧盟，尽管目前他们仍与英格兰和威尔士保持法律上的联系，这使得英国脱欧更加复杂。苏格兰首席大臣 Nicola Sturgeon 在英国脱欧公投后的第一时间宣布，：“苏格兰投票表决，以压倒性的优势同意留在欧盟”，“苏格兰正面临被带出欧盟这一违背我们意愿的境遇，我认为这在民主上是无法被接受的……从今天下午开始，（苏格兰）大臣们将致力于与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商业团体展开讨论，以表达我们坚定的留欧信心”。

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6 月 23 日的公投对英国和欧盟都不具有约束力。在英国，议会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想要扭转公投结果不大可能。在欧盟，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规定了脱欧的程序的一些细节，并规定由相关成员政府启动脱欧程序。“成员国若决定退出，应告知欧洲理事会。”

更进一步，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的规定意味着成员国告知欧盟的义务成为一个计时器，激励着当事者们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就脱欧事宜达成一致。如果两年之后没有达成以上的一致，谈判时间延长，欧盟成员国身份自动终止，这对于该国破坏力巨大，任何理智的政府都会努力在规定时间内达成可接受的条款。

因此，对于英国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鉴于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规定和 6 月 23 日的公投结果，英国政府将何时告知欧洲理事会？英国首相卡梅伦于 2 月

在下议院说过公投结果出来以后，“英国人民将希望这项程序尽快启动”。然而在他的辞职演讲中，卡梅伦明确表示他将会把告知欧盟理事会作为待办事项留给下一任首相，也许是今年夏天之后的事情了。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十月的保守党会议开始之际选出一名新首相，与欧盟的协商需要由新的首相开启，我认为应该由新任首相去决定何时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开启脱离欧盟的正式法律程序。

与此相反，欧盟全体相关机构的首脑于 6 月 24 日发出的一份联合声明要求尽快启动协商进程：“即使过程可能很痛苦，我们现在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尽快使英国人民的决定生效，任何拖延都将导致不确定性，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有一套固定的规则。里斯本第 50 条规定了成员国脱欧的遵循的程序。我们已经做好启动这一进程的准备工作。”

其他方面上，欧盟机构的首脑们希望英国脱欧的影响是明确的。可以理解，他们担心一个成员国的公投将给其他成员国带来示范作用，即脱欧并非痛苦的过程。因此，他们急需尽快建立真正的先例。当然，想要评判这种协商的成果还为时尚早。他们也许希望欧盟的立场不是惩罚，但也不要掺杂情感。

实际上，欧盟在推进协商进程方面力量有限，正如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规定，这个进程的触发并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因此欧盟只能等到英国公投的本国政治影响全部整理好后，才能开始真正的商业协商。正如英国公投期间那样，虽然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但欧盟机构和其他所有欧盟成员国必须时刻保持旁观者的视角观察事态的戏剧性发展。

本文原题为“The UK / EU separation: how fast does it happen?”。本文作者 Nicolas Véron 为 Bruegel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本文于 2016 年 6 月刊于 bruegel 研究院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脱欧的金融业后果

Jon Danielsson, Robert Macrae, Jean-Pierre Zigrand/文 安婧宜/编译

导读: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此举给英国和欧盟带来了新的机会和风险。二者都可能受益,但更可能的结果是金融规则的质量下降,效率的下降,更多的贸易保护和更大的系统性风险。编译如下:

昨日,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此举将会产生广泛的金融后果,带来机遇与挑战。

多样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系可以提高金融稳定性(Danielsson 2013),而脱欧会给英国带来与欧盟完全不同的管理体系,因此此举可能会提高世界金融稳定性。

然而,此举的收益可能并不明显。尽管脱欧的支持者们鼓吹英国脱欧后可以自行制定管理规则,但是大多数市场参与者仍需与欧盟交易,所以将会受到本国和欧盟规则的双重限制。

一个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英国的金融体系可能会变得更加无效和动荡。

新危机

金融市场正在经历动荡,它最初的反应证明了英国货币和世界资产市场的脆弱性。理所当然的,银行可能会面临最大的危机。

但是,系统地来看,这些市场震荡真的重要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市场只会反应贴现信息,无论这些信息是好是坏。而金融体系则会适应这些变动,从而运行下去。当然,适应过程可能并不明晰。同时,尽管系统性危机不太可能发生,但可能性依然存在。

英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它相对脆弱的经济增长都严重依赖于接近于零的利率,以至于无法自拔。政府大举借债,养老金不充足,而金融市场对那些可能产生经济增长的小企业提供资金的愿望也十分有限。与此同时,由房地产支持的贷款收益率也非常低。

很容易想象,债券购买者们会像那些在上世界六十年代的“苏黎世侏儒”一样,不再将资产委托给英国。由于债券价值对通货膨胀极度敏感,在恶性循环中,英镑会贬值,通货膨胀会发生,收益会提高,而债券价格则将下降。

如果这真的发生了，债券价格会在数年中缓慢下降。又或者，如果债券持有者通过出售债券来稳定投资，那么债券价格就会下降得非常快。后一个结果可能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那么英国中央银行有什么应对措施？它可以通过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来维持名义资产价格（尤其在房地产领域），以此为各类银行提供资金（像中国模式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这样做将使英国中央银行未来面临更高风险的通货膨胀。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则将会引发房地产市场崩溃和更大规模的破产，那么接下来的局面很可能就是央行得用大量资金来援助幸存者。

欧洲

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对英国金融市场的三个方面不满：它拒绝很多欧盟的规则，如奖金制度等；它坚持不使用欧元；另外就是它的规模。

当英国决定脱欧，欧洲可以制定自己想要的规则的时候，这三个方面都会改变。

欧盟的目的是降低伦敦的竞争力，转而提高法兰克福和巴黎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欧盟会制定有利于金融活动转向欧洲的措施，这个诱惑很难抵挡。

目前存在一些因素可能导致欧洲和英国的系统性风险都上升。在那些没有足够时间来熟悉新形势的政策制定者的监控下，新型风险会出现在欧洲；在英国法下，新合同无法制定，也无法检验，从而不会像现在一样具有确定性；又或者，脱欧会降低欧洲金融信息的流动性，使得建立全欧洲范围的风险抵御机制更加困难。

同时，欧盟将资源从储蓄者手中高效配置到公司那里的能力很可能会大大削弱。比如，资本市场联合体显然就会失去重要的支持。

欧洲金融系统将会更加多样，并以破坏性的金融体系为代价，来支持传统银行系统。英国在一些拥有类似想法的国家支持下追求更加自由多样的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银行的过度主导权会被削减。

最后，没有了竞争带来的规则，而过分依赖于贸易保护主义来防止产品进入，一个更严格和无效的欧洲金融市场可能会形成。这对欧洲的储蓄者和企业家来说都不是个好消息。

英国

英国和欧洲制定规则的方式十分不同。英国规则基于基本法，只在需求存在的时候才会凸显，而且十分透明，依赖于自我约束。而对比之下，欧洲的规则制定则基于民法，并且强调尽可能地规定最多的行为。

英国这种更加灵活的方式，对促使伦敦成为欧洲重要的跨国金融中心有着重要作用。

很多英国投票者不看好欧盟规则，认为它太过详尽，难以实现。英国的政策制定者成功地摆脱了一些欧盟法中过于冗杂的部分，如《金融市场工具指令》（Mifid II）；但也同时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系统风险，如《偿付能力规定》（Solvency II）体现的那样。

如果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和欧盟达成某种协议，使与这一独立市场的联系得以维系，同时英国出口商又无需再遵守欧盟的法则——这是一个不大可能的情况——他们就更加可能制定出一套灵活的新规定。在可以进入欧洲的情况下，这些新规定可以使英国金融更加繁荣，甚至赢取新的市场。

但是，一种更可能的结果是，政策制定者徒劳无功。

要将金融规则的法律基础从布鲁塞尔转回伦敦，立法和制定规则的工作量将是巨大的。所以多年以来，规则制定者必须得努力才能维持现状。

从全民公决之前的言论来看，留欧派阵营不太可能已经为目前的情况做了太长时间的准备，所以一段时期内的会无法避免。而且，即使这些工作负担减轻了，遵守欧盟的规则也很可能是进入欧洲市场的代价，因此对于国内市场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来说，它们未来的前景并没有什么改变。

同时，从英国决定退出欧盟后，它对欧洲政策制定的话语权将会完全失去。英国所能希冀的最好情况便是一个欧洲经济区类型的协议（EEA），即被允许进入欧洲市场，但必须遵守欧洲的规则且没有影响规则的能力。

结论

理论上，脱欧给了英国和欧盟一个提高金融市场的弹性，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机会。不幸的是，脱欧更可能意味着大量相关工作而带来的金融瘫痪。

随着最大的自由主义加盟国的离去，欧盟可能会大幅提高规则强度，更加关注政治和贸易保护而非效率。这将会导致一个更加多样化和高成本而非更加安全的金融体系。

最可能的情况是，英国规则将会变得十分繁重，因为众多参与者需要遵守英国和欧盟双重规则，而英国失去了对欧盟规则影响权。随着时间的推移，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逐渐失去。

而最坏的可能是，恶性循环将会发生，而英国则会失去所有。

本文原题为“On the financial market consequences of Brexit”。本文作者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本文于 2016 年 6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脱欧：滑入第 50 款深渊

Simond de Galbert /文 朱子阳/编译

导读：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但脱欧涉及复杂的欧洲法律程序，其中之一就是第 50 号条款，作者围绕这一条款，展开了细节分析，编译如下：

欧盟领导人已经从英国决定脱欧的政治震惊转向了与英国的持续谈判。这场“离婚”始于 2009 年制定的欧盟第 50 号条款。面临第一次有成员国退出欧盟，欧盟领导人能否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呢？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一条款无疑是不确定性的深渊。

退出谈判有时间表吗？

欧盟第 50 号条款说明了一系列步骤，首先，英国需“通知”欧洲理事会，这一知会可以是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信件或是在欧洲理事会会议间的官方申明，而其他形式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在周五的辞职演说中，卡梅伦坚持“新首相选择何时启动 50 号条款和脱欧的法律程序”。因此，英国的知会程序只可能发生在卡梅伦提名继任者之后，这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虽然许多欧盟领导人，例如法国总统奥朗德，希望尽快开始谈判，但是除了向卡梅伦施加压力以尽快启动法律程序以外别无他法。

一旦新首相启动第 50 条款，谈判将启动并且将有两年的缓冲期。如果与欧盟的协议没能按时达成，那么谈判将拓展至全部 27 个成员国。第 50 条款没有限制这一现象，这一谈判可能会持续数年。

英国与欧盟究竟需要谈些什么？

目前，有两件事情需要两党达成共识。其一，英国如何离开。在谈判中必然有临时性措施直至一个新的关系建立起来。而这一协议需要欧洲议会决定，由专门委员会实施，并由成员国投票。这要求有 72% 的成员国同意，并且这些成员国人口应在欧盟人口的 65% 以上。其二，是未来的关系究竟如何界定。而这涉及英国、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此外，成员国投票之前，欧洲议会还需首先通过。

虽然目前进行过渡期的谈判是当务之急，但过渡期的关系也取决于对于英国和欧盟未来关系的界定，两者是同等重要的。此外，第 50 条款并没有剥夺英国在正式推出之前继续参与欧盟事务的权力，而这一点对于欧盟民众是不可接受的。英国已经不属于欧盟，却在未来两年内继续塑造和影响欧盟。

英国将与谁进行脱欧谈判？

第 50 条款规定，欧洲理事会在排除英国的情况下，提名“欧盟谈判代表以及代表团团长”，这也是常规的针对第三国的谈判安排。而且，欧盟委员会作为欧盟的常设代表，也将参与谈判进程。此外，其他欧盟机构可能牵涉其中，例如欧洲议会将对协议进行投票。

英国还能反悔吗？

这很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

一旦谈判完成，英国将脱离欧盟，但英国仍可以再次申请加入欧盟。

一旦第 50 号条款生效而谈判仍未完成，英国可以选择撤销他的退出申请。这可能在英国不满意谈判代表或者英国国内发生巨大变化（例如苏格兰正式独立）的前提下发生。理论上来说，撤销退出将可能中断两年缓冲期，并使得英国继续留在欧盟。

另一种可能性是英国压根不启动第 50 号条款。Boris Johnson（极有可能继任首相职位的候选人）认为，英国不应当急着递交脱欧申请。他可能重新启动与欧盟的谈判，同时他还需要议会的支持以及民众的支持。但是，欧盟几乎不可能接受这一策略。

这周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会议将作何反应？

目前还不清楚欧洲理事会将讨论什么样的议题，当然，英国脱欧必然包括在内。英国首相应当就他的观点在周二时发表讲话，因为周三的非正式会议将没有英国参与。

但是，欧洲大国似乎也有分歧。德国总理默克尔倾向于维持英国与大陆的良好关系，就诸多细节问题进行谈判。而法国、欧盟委员会，甚至于德国外长，倾向于快速结束谈判。他们认为，过长的谈判可能引起欧洲共同安全问题，引起盟友的忧虑和暴露出欧盟更多的问题。

本文原题为“Brexit: A Leap into the Article 50 Dark”。作者 Simond de Galbert 是 CIGI 访问研究员，资深欧洲事务专家。本文于 2016 年 6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使欧盟更坚韧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Resiliency Authors/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英国退出了欧盟，这对双方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它可能为后续的负面冲击和政治影响做出了铺垫。VOX 欧盟评论专家团在本文中提出了提高欧盟坚韧度的一些意见。编译如下：

我们相信英国脱欧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既然木已成舟，我们需要弄清楚如何控制后续的负面效应。欧元区在缓慢增长，如果事情会按照预测的发展，那么低失业率、健康的经济形势是指日可待的。但预测往往不准确，比如说我们就没预计到英国会脱欧。那么问题来了，欧盟是否足够坚挺，能抵抗未来几年里将会发生的负面冲击？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为了抵御冲击，欧元区需要改革，政治上进一步团结起来。但是团结在当今的政治气氛中并不合时宜，所以形势极为困难。也有学者持乐观态度。尽管欧元区建设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但是基本框架已就位。只需要一个政治上的重大突破，就能够增强欧元区的坚韧与团结。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什么是当务之急，以及能够期待的后续工作。我们只给出一个框架，避免进入无休无止的细节讨论中去。

银行与金融系统

为了达成两个目标，需要构想出一个优秀的金融体制。两个目标是：1.减少银行违约。2.当违约发生，能够控制整体经济形势。

这个体制已基本建立。监管在不断加强，压力测试在逐渐改进。单一清算方案已就位。单一清算基金能够在必要时提供资金。在这之上，还有欧洲稳定机制提供流动性和稳定性。未来将会建立欧元存款保险，进一步提高欧元区的坚韧度。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确保规则得以实施。意大利提供了一些思考。一，不良贷款目前在增长，其价格要比市场价格高得多。二，意大利政府不愿意介入银行自救行动。以上因素导致规则并不可信，至少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修改或强制执行。什么措施不是那么急迫呢？银行的资产需要多样化，以抵御国内冲击。银行需要减持本国国债，但这还不够，因为国债并不是主要部分。更大的风险来自于国内贷款，贷款也必须分散化。尽管短期内并不可行，但长期内需要把救助银行的职责从国家政府转向欧洲稳定机制。

公共财政

即便在未来一段时间，利率保持低位，公共债务仍旧过高。公共财政改革需要保证：1.减少违约风险。2.一旦违约，可以控制住。

确立好的规则和规范市场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违约风险。目前积累了太多的规则，这使得规则笨拙、难以执行，应简化规则。对于多数国家，支出而非赤字，才是主要问题。因为高支出使得征税困难，难以达到预算。应确立减少支出的规则，将负债水平与支出水平联系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如果负债者不清楚他们无法偿还债务的结果，那么他们就不会有所忌惮，这样，市场就会失去秩序。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已经建立了欧元稳定机制。这个机制尚未完善。首先，当欧元区出现大范围危机，机制还没有足够能力应对。第二，考虑到机制目前做决定的过程，市场不确定它能否及时做出适当的反应。目前的形势要求欧洲稳定机制能够做出快速应对。第三，目前的体制内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协助所有相关方面进行债务结构改革。在极端情况下，更是如此。需要有人站出来，欧洲稳定机制是不错的候选人。

什么措施不是那么急迫呢？

解决欧元公共债务后续问题的提案将会非常有帮助。考虑到目前的低利率水平，这个事情可以放缓进行。另外，当前的政治氛围也不利于此。另一项措施是将国内的经济危机分散至国际间。有些人提议，将目前的国债模式改为财政转移模式。这是不错的想法，但缺乏大环境支持，至少目前欧洲还不统一。

偿付能力与流动性

对于银行和政府，当务之急是让政策制定者解决流动性问题。流动性缺乏时，欧洲稳定机制是正确的解决方案。欧洲中央银行能够帮助银行解决流动性问题，同时直接货币交易能够帮助政府提供流动性。目前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两种机制合并。这能够帮助欧洲央行明确职责，让市场增强信心。

结构性改革

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总是令人向往的。欧元区的改革与其他地区改革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吗？答案是肯定的。人口流动和经济低迷使得欧元区的制度问题更加糟糕。好的改革还能够改良政府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通过资源配置、增加竞争、成本调整财政联盟的功能将得到改善。改革不容易，过程会很缓慢，即便如此，改革总是值得的。

我们已经探讨了当务之急，其他问题虽不急迫，但不意味它们并不重要，应尽早提上日程。

本文原题为“Making the Eurozone more resilient: What is needed now and what can wait?”。本文作者 Resiliency Authors 为 VOX 专家团，成员包括：Richard Baldwin, Charlie Bean, Thorsten Beck, Agnès Bénassy-Quéré, Olivier Blanchard, Peter Bofinger, Paul De Grauwe, Wouter den Haan, Barry Eichengreen, Lars Feld, Marcel Fratzscher, Francesco Giavazzi,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 Daniel Gros, Patrick Honohan, Sebnem Kalemli-Ozcan, Tommaso Monacelli, Elias Papaioannou, Paolo Pesenti, Christopher Pissarides, Guido Tabellini, Beatrice Weder di Mauro, Guntram Wolf, 和 Charles Wyplosz。本文于 2016 年 6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